新技术革命语境下，媒体的新理念及其落地

薛 静
（北京体育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北京 100084）

摘 要：新一代革命性技术让万物互联与万物皆媒成为现实，这对媒体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媒体迫切需要以新的理念来指导实践。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精神交往论视域出发，新技术革命语境下媒体的新理念可提炼为：媒体实践要有助于实现人对自己本质的全面占有。这一理念需要从思维层、行动层、态度层三个层面进行落地，具体体现为：在思维层媒体行动者应积极培育和践行系统思维；在行动层应以社会调查、用户解读、数据分析、视觉表达、快速写作、趋势预测这六种能力的具备和运用来提升传播效能；在态度层应以拥抱不确定性和永恒关怀的积极精神关照媒体的实践与发展。

关键词：新技术革命；新理念；精神交往；系统思维；提升效能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34（2021）12-045-03 DOI：10.19483/j.cnki.11-4653/n.2021.12.012
本文著录格式：薛静．新技术革命语境下，媒体的新理念及其落地 [J]. 中国传媒科技，2021（12）：45-47.

5G、大数据、算法、VR、AR、人工智能、区块链、传感器技术等新一代革命性技术让万物互联与万物皆媒成为现实，人、物、环境都可以成为传播主体，越来越多的设备可以成为网络终端，人、物、环境可以展开对话，三者之间将形成全新的信息互动关系，这对媒体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因此需要以新的理念来指导媒体的日常实践。本文拟从精神交往论视角出发对新技术革命背景下媒体的新理念加以提炼，并对新理念的落地实践浅做探讨。

1. 新理念的提出：媒体实践要有助于实现人对自己本质的全面占有

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精神交往论”视域出发，自从有人类以来，精神交往活动始终伴随着人们的生产与生活，成为人和人类群生命存在的一部分。人本身的发展、不同时期的社会环境、交往手段的发展等等“多种多样的某物”，构成了精神交往的物质基础，这便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交往观。[1] 以此观之，在新技术革命的背景下，“多种多样的某物”变得复杂而丰富，因此，人们进行精神交往的物质基础呈现出繁荣富余的特征。

此外，精神交往与精神生产密不可分，精神生产的产品在现代社会更多地表述为信息，从事精神生产的行业叫作信息产业、文化产业或内容产业。广义上的媒体是信息产业、文化产业和内容产业本身或其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以此观之，媒体是现代社会最典型和最不可替代的精神生产机器，在新技术革命使得万物皆可为媒的现实下，媒体的这一特性和重要性更加凸显。

另一方面，马克思认为，人是自然性与社会性的感性统一，而人的社会性也不仅仅指人们生活于一定的经济、文化和政治生活中，更是指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和共同活动。当下新技术革命带来了媒体的泛在化和个人化，因此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共存和共同活动，以及人们生活的各方面都高度依赖媒体，而且这种依赖已经到达了不可逆的状态。

综上所述，从精神交往论出发关照新技术革命的后果，可以得出“精神交往的物质基础繁荣富余、媒体其‘精神生产机器’的特性和重要性凸显、人的社会性的实现高度依赖媒体且不可逆”的结论。

同时，马克思总结说：“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关系，所以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关系、社会本质”。这句话说明了人的精神交往得以产生和发展的最重要的内在动因。[2] 这个动因可以总结为：人对实现自己本质的追求。以疫情期间的“云生活”为例，出于疫情防控的需要，举国人民在春节期间便进行居家隔离，网络的发达拓展了人们的“活动空间”，使人们的活动范围从有限的家庭物理空间拓展到了线上丰富无边的“虚拟空间”，“云生活”便成了疫情隔离期间一种典型的社会景观。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精神交往视域来看，“云生活”充分关照并迎合了人“天生的积极进行社会交往的本能”，其兴起在一定程度上舒缓了疫情隔离的压抑感并重建了因疫情隔离而隔断了的人们与现实生活的联系和纽带。“云生活”为人们在疫情隔离的情况下实现其社会性提供了土壤，也为人实现自己的本质提供了契机，而这一切在前技术革命时代，都是无法实现的。

人对自己本质的全面实现，有一个明显的必需前提，即精神交往是自由的生命表现，如果这种交往是迫于外在的需要，而不是内在的自然表现，那么交往过程会受到扭曲。[3] 以疫情期间关于雷神山、火神山医院建设的慢直播现象为例，几千万网友对医院建设的“云监工”形成了极具代表性与典型性的媒介景观。网友们在集体

观看直播的同时还为直播画面中各种施工设备和建筑物进行“取名”，比如“叉酱”“送灰宗”“送高宗”“蓝忘机”等等，体现了网友们对疫情这一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关注度，也体现了网友们对推进事件良性发展的参与度，其所带来的自主参与体验和传递的期待、鼓励、团结等正情绪充分体现了网友们交往的内在性、自然性、非强迫性，是“自由的生命表现”，有助于实现人对自己本质的全面占有。这一正面事例是由“慢直播”这一新媒介生发的，新媒介背后是新技术。

因此，结合前面从精神交往论出发关照新技术革命的后果所得出的一系列结论以及人的本质及人对自己本质的全面占有方式来看，媒体有必要提出新的理念来指导实践，这一新理念即：媒体实践要有助于实现人对自己本质的全面占有。

2. 新理念的落地

当下媒体领域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媒体环境的市场化现象显著存在，媒体融合的进程也在稳步向纵深方向推进，涉及到技术、功能、产业、组织机构等方方面面的融合。[4] 在这种背景下，需警惕媒体对经济利益的一味追逐，避免其受到资本、权力的侵蚀而徒遭异化之境。因此，突出与强化精神交往理论在媒体理论与实践中的指导作用，显得必要且迫切。而“媒体实践要有助于实现人对自己本质的全面占有”这一新理念的提出，不失为一种积极的尝试，也极具现实意义。这一新理念的落地，可具体从思维层、行动层、态度层进行实践。

2.1 思维层：媒体行动者应积极培育和践行系统思维

媒体行动者既包括利用各类媒体形式进行信息传播的个人、组织、机构、平台、企业，也包括媒体业界的从事者与媒体学界的研究者。

新技术革命背景下，各种各样的新媒介链接的不仅是事实因素和客观因素，更链接了复杂的非事实因素、非逻辑因素、社会因素、心理因素和情感因素，是一个更为庞杂的系统。著名系统思维的创造者德内拉・梅多斯关于如何建立研究复杂性的“系统思维”时告诉我们：（1）不要被表象所迷惑；（2）在非线性的世界里不要用线性的思维模式；（3）恰当地划定系统的边界；（4）考虑多重限制性因素以及相对强弱；（5）理解无所不在的时间延迟；（6）清晰地意识到“有限理性”。[5] 这对人们重新认知当下复杂的媒介属性和应对非模式化的媒体实践提供了思维层的启发。

系统思维应强调结构化思维和发散思维的结合。在传统媒体时代，媒体从生产流程到经营模式都呈现出高度的结构化特征。随着媒介技术的更迭，非新闻媒体的人和社会组织对媒体传播活动的介入规模越来越大，到当下的智能化传播时代，智能化媒体对信息的获取不再拘泥于传统的相对专业化和结构化的信息获取渠道，而是广泛地利用社会化媒体、传感器技术等获取信息资源。这一事实迫切需要媒体行动者具备发散思维以应对复杂的信息获取环境，从数据海洋中打捞、提炼和获取精准信息。但另一方面，技术在为媒体实践带来许多积极可能性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诸如技术理性、道德失范、价值旁落等隐忧。媒体作为社会重要的“精神生产机器”，有义务以规范性操守为其媒体实践框定边界和设定底线，不仅需要坚守真实、客观、准确的“专业主义”精神，也需要维系公共性、公益性等社会效益，这类操守、精神和圭臬需要媒体以一种结构化思维的形式进行内化，从而指导日常的传播实践和传播目标的落地。因此，在新技术革命语境下，对媒体行动者而言，真正的系统思维需要做到结构化思维和发散思维的良好结合。

2.2 行动层：六种能力提升传播效能

在智能化传播的现实下，对于媒体而言，会更加强调对传播时效、传播内容的质量、传播技术的应用这三个层面的把握。[6] 因此，媒体应当具备并提升六种能力：社会调查能力、用户解读能力、数据分析能力、视觉表达能力、快速写作能力、趋势预测能力。

社会调查能力强调实践、观察、客观、真实。正所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对于媒体而言尤其如此。新技术下信息在碎片化、粉尘化传播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同质化问题以及信息的权威性、真实性、严谨性旁落问题，[7] 并伴随着内容深度、内涵和质量的缺失。鉴于此，媒体基于扎实的社会调查对信息进行有价值、有关联、有逻辑的“深度开掘”就显得十分必要。社会调查能力的具备和提升是对信息“快餐化传播”的抵抗。

用户解读能力强调对用户的全方位洞察和精准把握，涉及到用户的人口统计学特征、生理、心理、兴趣、习惯、心境、价值、群体归属、社会规范、伦理道德、文化属性等诸多层面。对用户的解读是为了在媒体实践中更好地获得用户的认同，提高用户画像和文章画像的匹配度，从而提升传播效能。

数据分析能力是大数据时代媒体工作者一项必备的技能。新技术革命背景下，数据已经成为社会的基础资源，其作用和价值将如同空气和水一样不可或缺。在这样的现实下，数据分析能力必然成为媒体行动者的基础能力，这不仅对媒体行动者的数据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需要媒体行动者掌握相应的数据分析技术。面对浩瀚如海的数据，怎样从中区分出比特、符号、意义、信息、新闻、现象与价值，是媒体工作者的必修课。

视觉表达能力的提出是基于我们的文化已经由以文字语言为中心的文化形态向以图像语言为中心的文化形态转移的社会事实。在当下的媒体环境中，直播、短视频、Vlog 等是以视觉表达为主的媒体形式的典型代表。随着各种技术的不断迭代升级以及这些技术在媒体行业的深度应用与联动合作，人们将会进入到一个更加丰富的图像世界，媒体用图像语言进行媒体表达已经成为常态，

这无疑对媒体的视觉解码能力和视觉表达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快速写作能力旨在应对信息时效性的问题。在PGC、OGC、UGC以及MGC（机器生产新闻）并驾齐驱的信息环境中，媒体若想要让自己翔实的社会调查结果产生应有的传播效果和社会价值，就必须在第一时间快速写作并成稿成文，否则过了最佳的传播时间点，其结果必然是被其他媒体捷足先登，或是新闻失去其传播价值。在新技术背景下，快速写作的实现需要有效结合“人”的智能和“机器”的智能。

趋势预测能力强调对海量的非结构化的数据进行相关性挖掘，可以有效实现对如电影票房预测、突发事件检测、股票预测等社会化媒体事件趋势预测问题的研究。诸如对疫情期间流言、谣言等非理性传播现象进行提前的趋势分析和预测，便可以建立起相应的网络谣言预警机制，出台相应的网络谣言的应急预案，从而避免谣言现象带来的诸如人口迁移、抢购风波等社会危害。另一方面，趋势预测能力的具备与提升也可让媒体更好地服务于用户的媒体需求，从而更好地实现自身的经济效益。

综上，新技术革命浪潮中的媒体需以“社会调查、用户解读、数据分析、视觉表达、快速写作、趋势预测”这六种能力的具备与提升，来应对媒体实践中信息的汪洋之海，从信息冗余和有效信息匮乏的现实矛盾中自我解困，以保证对用户高质高效的内容输出，并在此基础上增强与用户的黏性，帮助用户实现从信息、知识到决策、行动的转化，从而更好地实现传播效能，发挥媒体的应有价值。

2.3 态度层：拥抱不确定性和永恒关怀

在新技术革命背景下，媒体实践是一场对付不确定性的博弈。面对复杂多元的技术环境和风云变幻的媒体环境，拥抱不确定性是媒体行动者应具备的开怀态度。当下，人们生活在“风险社会”，各类危机事件频发，各类考验媒体人其媒体实践水平的新闻层出不穷，面对这样的现实，媒体行动者不仅要做好“危机时的管理”，更要做好在日常实践中进行“润物细无声”的“常态化危机管理”，换言之，要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将危机管理视为媒体的基础素质和必备基础技能，坦然面对和处理媒体实践中的各种不确定性。当下媒体行动者要直面这样一个现实：民智已开，“透明”已经成为刚需。因此，尽管日常的媒体实践充满了不确定性，但“求真”应永远处在媒体人实践考量的第一顺位，在求真的基础上，尊重公众、服务公众并且忠于公众，才能真正实现“维稳”和“管理”，才能真正保证媒体的公信力。同时，媒体行动者要以开放创新的精神探寻新的媒体界定方式，生成新的话语方式，以“庙堂式”到“江湖式”的语态变革打破与用户的符号区隔，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新媒体中心推出的《主播说联播》和两会报道中Vlog的应用就是很好的尝试。除此之外，当下媒体社会化和社会媒体化同步进行，媒体与社会其他行业和子系统的联动效应和蝴蝶效应愈加凸显，在这样的情形下，媒体以兼容并包之态对非媒体要素的纳入与包容，并在日常的媒体实践中加以考量，就显得十分必要。

技术在为媒体带来诸多想象力与发展动力的同时，也滋生了许多负面问题和社会隐忧，比如伦理问题、隐私问题、数据安全问题。人们在欢呼技术福利的同时，也应对其背后的潜在威胁性力量保持冷静与警惕，Facebook泄露门事件无疑为我们敲响了一个警钟。目前针对这些新技术导致或可能导致的负面问题，媒体应建立基于人本主义、道德主义与契约主义的伦理体系，以人本逻辑指导技术与社会融合，助力于社会理性的增长。毕竟，媒体实践的本质，无关于资本、流量、技术，而有关于关怀众生与社会的无限美德。媒

参考文献

[1] 陈力丹．精神交往论[M]．修订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6.

[2] 陈力丹．精神交往论[M]．修订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40.

[3] 陈力丹．精神交往论[M]．修订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45.

[4] 赵文权．融合背景下基层媒体的创新发展策略[J]．中国传媒科技，2019（11）：49.

[5] 喻国明，曲慧．边界、要素与结构：论5G时代新闻传播学科的系统重构[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9（8）：67.

[6] 曹伟锋．浅谈媒体融合环境下的传播策略——以常熟日报社应用全媒体技术增强传播效果为例[J]．中国传媒科技，2019（7）：107.

[7] 宋博．浅析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的优势互补与整合[J]．中国传媒科技，2021（3）：50.

作者简介：薛静（1992-），女，四川巴中，2020级硕士在读，研究方向：体育新媒体。

（责任编辑：胡杨）